

## 中东城市化、市民心理危机与社会稳定\*

张 丹 车效梅

**内容提要** 中东城市作为全球城市化进程中矛盾和冲突的前沿阵地，存在着众多影响中东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其中，市民心理是城市化产生多维影响的直接体现，政府不同的政策和市民阶层的差异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社会心理。中东城市化具有过度城市化的鲜明特征，迅速发展的城市化提高了市民的心理预期，却无法满足不同市民实际社会需求；城市的异质性使市民产生孤独感、寂寞感、不信任感；制度的革新也容易促使一些市民产生心理危机，这些都成为影响城市稳定的重要因素。边缘群体的心理危机随时可能导致其负面行为。因此，欲解决中东城市化中的市民心理危机与城市稳定问题，一方面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使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得到保障；另一方面要加强城市治理。

**关键词** 心理危机 社会稳定 中东城市化 城市治理 边缘群体

**作者简介** 张丹，山西师范大学2016级博士生（临汾 041000）；车效梅，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院长、教授（临汾 041000）。

在全球化时代，城市是全球秩序最直观的表现场域，也是体现全球化矛盾集中与尖锐之地。从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到2010年的“阿拉伯变局”，中东城市屡次成为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前沿阵地。当今城市研究的重中之重已不在于关注城市化的广度与深度，而在于面对成为全球化矛盾焦点并且

---

\* 本文系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丝绸之路城市史研究（多卷本）”（18ZDA213）、山西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20世纪中东城市转型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在社会稳定中发挥愈加凸显作用的城市，我们如何维护这一关乎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中心。值得注意的是，在中东城市化<sup>①</sup>进程中，由于速度过快且主要以西方城市为模板进行城市建设，由此导致城市社会成员的心理不稳定因素增加，而市民的心理稳定则直接成为审视中东城市化结果以及影响中东社会稳定的重要变量。

社会稳定包括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秩序稳定以及社会心理稳定。其中，社会心理稳定即人心稳定，既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内容，<sup>②</sup>也是社会稳定的综合反映。它可视为绝大多数民众对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政治理论认同，对社会状况基本满意，不存在思想认识严重混乱和情绪巨大波动的现象。目前，学界对中东城市化与社会稳定的主要研究视点如下：第一，关注城市化与政治稳定二者的关系。迈克尔·博尼恩（Michael E. Bonine）运用人口、贫穷、政治三要素，对中东地区的城市化与政治动荡关系进行实证研究。<sup>③</sup>第二，探究城市化与城市边缘群体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的关联。法哈德·卡泽米（Farhad Kazemi）在《伊朗的贫穷与革命——边缘群体、城市边缘性与政治》一书中，采用实证调查法，分析了旧政权之下城市贫困移民生活日益边缘化的状况及其革命动员过程，提出贫困移民除了要为食物及就业奋斗外，非法居住者还因土地和住房权益问题而参加械斗。<sup>④</sup>穆罕默德·阿姆贾德（Ahmad Sharbatoghlie）在《从王权专政到神权政治》一书中则指出，城市革命的根源同阶级斗争、国王随意使用武力、农业衰败、经济管理乏力、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城市繁荣后经济衰落等因素密切相关。<sup>⑤</sup>詹姆斯·托特（James Toth）的《埃及农村移民对国家的冲击（1961~1992）》阐述了农村移民对国家的影响，特别是对移民抗议政府运动作了详尽的论述。<sup>⑥</sup>第三，阐释城市化对城市

---

① 中东诸国城市发展各有特点，而囿于篇幅，本文则侧重研究中东城市化与城市发展、市民心理的一般性特点。

② 胡联合、胡鞍钢等：《政治稳定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问题研究》，红旗出版社，2009年版，第244页。

③ Michael E. Bonine, *Population, Poverty, and Politics in Middle East Cities*, Florida University Press, Florida, 1997.

④ Farhad Kazemi, *Poverty and Revolution in Iran: The Migrant Poor, Urban Marginality and Politics*,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1980.

⑤ Mohammed Amjad, *Iran: From Royal Dictatorship to Theocracy*, Greenwood Press, New York, 1989.

⑥ James Toth, *Rural Labor Movements in Egypt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State, 1961-1992*,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Florida, 1999.

阶级分化的影响。马苏德·卡玛利（Masoud Kamali）认为，国家和乌里玛之间的平衡关系被打破，促使乌里玛阶层加速分化，霍梅尼和激进宗教人士能成功夺取政权，部分原因是霍梅尼提出一套革命理论，部分因为城市边缘组织接受该理论，他们支持激进宗教人士的革命活动。<sup>①</sup>这些研究成果虽各有突破，对城市化与社会心理稳定也有涉及，但相关的研究仍较为薄弱。鉴此，本文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东国家城市化发展为主线，以市民心理危机为切入点，探讨城市化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 过度城市化进程中市民心理危机的表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城市化进入快车道。1960~1970年，中东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为5.95%，1970~1975年为5.1%。<sup>②</sup>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东城市人口增长率为4.5%。<sup>③</sup>进入21世纪后，中东城市化速度不减。据联合国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西亚城市人口已达到1.74亿，占总人口的70%。<sup>④</sup>由此可见，就城市化的“量”而言，中东各国已普遍实现了城市化，且大部分国家已处于或即将处于高级的城市化阶段。而就中东城市化的“质”即城市化现代化水平而言，整体水平仍相对滞后，主要表现为中东地区出现了过度城市化现象，由此造成失业、社会组织紊乱、出现城市贫民窟等诸多问题。中东国家低质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不仅使城市在很短的时间内快速聚集了大量人口和财富，使城市空间和社会结构发生巨变，而且也促发了作为城市社会主体的人的嬗变。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在城市中交汇，城市要素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加强，导致城市社会成员心理的变化与失衡，产生心理危机。

心理危机常常表现为心理的恐慌和焦虑。在城市化进程中，新旧制度交替引起社会群体变化，信仰危机、压力感、社会恐慌等心理危机现象极易产生。一旦这种危机情绪持续扩散，极有可能演化为社会心理危机。尤其在社

---

① Masoud Kamali, *Revolutionary Iran: Civil Society and State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Ashgate, Farnham, 1998.

② G. H. Blake and R. I. Lawless, *The Changing Middle Eastern City*, Harnes, 1980, p. 44.

③ 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出版社，1990年版，第238~239页。

④ United Nations, *The World's Cities in 2016*, New York, 2016, see <http://www.unpopulation.org>, 2018-07-26.

会转型期，如果人们无法适应社会变化，便更容易产生强烈的无助感、挫败感等负面心理。因此，社会转型期也是人们社会心理危机表现尤为明显的时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大部分中东国家经历了从建立民族国家到探索与推进经济、社会建设的过程，经历了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其中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世俗化无一不触动中东国家人民的神经。在这个转型的特殊时期，中东市民出现的社会心理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 （一）中东市民社会信任感缺失

“信任（trust）是一种相信某人的行为或周围的秩序符合自己愿望的态度，是交换与交流的媒介。”<sup>①</sup> 社会信任感是对社会经济生活影响最大的社会心理因素，它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又反过来作用于社会心理。从经济角度来看，社会信任感对政府绩效、大型组织绩效、居民的社会活动参与度以及社会效率等方面有极大影响。社会的普遍信任可以推动人们之间的合作，从而提高社会的交易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反之，在低信任社会中，人们及组织之间经济活动基础不牢，自发性经济交往活动少且形式单一，这深度影响着人们之间的经济与社会交往活跃度，从而引起人们社会心理变化。

在中东，受到过度城市化影响，存在市民社会信任感缺失状况，具体表现在三方面：第一，政府诚信下降，导致市民怀疑甚至不支持政府。由此，增强政府诚信是增强社会信任感的关键。20 世纪 80 年代末，除产油国外，中东国家经济开始低迷，以高投入维系的惠民政策难以为继。同时，中东过度城市化与城市治理水平低下使腐败与“城市病”日益严峻。政府诚信大打折扣，社会成员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心理失落感，从对政府的支持逐渐转向对政府的怀疑甚至不支持。第二，市场主体之间信任感缺失。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交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任的作用更加明显。然而，在中东城市中，食品安全、商业欺诈、信用欺诈、偷税漏税等现象普遍存在。其结果导致买方不信任卖方的产品，卖方也不信任买方的金钱，顾客不信任银行财力，银行不信任顾客的信誉；经营者不信任股东，股东也不信任经营者等各种恶性循环。第三，一般社会成员之间缺乏信任感。中东国家的城市化与其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转换是相随而至的。随着中东城市化快速推进，中东经济进入转轨期，而农村移民潮是国家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反映。农村移民进城谋职、谋生，

---

<sup>①</sup> 郑也夫：《信任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9 页。

却常常遭遇来自城市各方面的歧视和打压，无法真正融进城市生活，成为“边缘群体”，新老市民之间信任感随之缺失。

影响中东社会信任感缺失的因素<sup>①</sup>主要有：其一是地域文化背景。中东国家国民中仍或多或少保留着游牧社会的许多文化特质，其中游牧民因在商旅中常常遇到打劫、抢掠的经历是中东城市居民缺乏社会信任感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二是地区交易发达程度。中东自古以来就是商业贸易占重要地位的地区，商业交易发达，但其中仍存在许多不规范之处。其三是人民受教育水平。中东国家一些民众受教育程度仍较低，尤其是城市化中的进城务工人员。其四是城市化水平和城市管理机制。中东的城市化“质”水平整体偏低，且全社会相互信任的机制不甚健全。

作为一种社会心理危机，社会信任感缺失不仅导致市民心理茫然、孤寂、无助等一系列心理问题，而且妨碍部门、单位、个人之间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协作，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增加中东城市社会成员的不信任感及其他心理危机。

## （二）生存环境失落感渐生

过度城市化既给刚刚踏上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城市带来了收益，也使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些挑战映射在市民心理则常常是一种难以言表的失落感。

第一是对城市空间体系改变的失落。新兴的中东民族国家的城市空间体系变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其一，铁路及公路的快速发展改变了原有的城市空间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论是中东国家政府、地方政府还是企业家，都对大规模兴建铁路、公路产生了浓厚兴趣。随即，铁路、公路沿线城镇人口迅速集中和增长，铁路、公路周边地区逐渐发展为大、中、小城市。其二，工业化带动下的高楼大厦林立成为中东大城市的新景观。中东国家特别是海湾产油国在石油经济的带动下，现代化高楼大厦成了中东大城市的地标。其三，私人空间出现变化。中东铁路、公路的修建不仅推动了城市化进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来中东的城市面貌和私人空间，特别是小街巷密布与死胡同繁多。城市空间体系的变化使市民原本熟悉的城市面目全非。面对

---

<sup>①</sup> 事实上，国内张维迎等学者对信任的研究与国外经济学家对信任的研究存在差别。国外经济学家以信任作为解释变量，来解释信任对政府绩效、居民社会活动参与度、大型组织绩效、社会效率等影响，而张维迎等人的研究以其他交通设施、城市化、高等教育、市场化指数、人群中的干部人数等来解释信任。笔者比较赞同前者的观点。

密集的公路、高耸的大楼以及现代的公寓住宅，一些市民由此感受到冷冰冰的钢铁水泥铸就的城市带给他们的冷漠与孤独。

第二是对人口极度膨胀的失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中东国家工业化的推进，中东城市人口普遍剧增。过于庞大的人口压力给中东城市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其一，极大地制约了工业化的发展水平。人口增长吞噬了大部分新增的国民收入，减少了储蓄和投资，加重了社会负担，不仅使人口和土地的比例失调，整体的经济效率下降，而且引起消费品生产的成本上升，生活水平下降。其二，人口膨胀造成食物供给紧张、通货膨胀。如经历大规模城市化后的开罗，消耗了全埃及进口粮食总数的一半<sup>①</sup>，推高了进口粮食价格，政府每年不得不斥巨资进行粮补，但效果差强人意；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基础设施供需紧张，出现了大量贫民窟。其三，人口膨胀造成严重的失业问题。仅 2010 年，中东地区的劳动力市场新增 723 万人。<sup>②</sup> 这些新增的青少年劳动者，往往缺乏劳动技能，为非熟练工人，因此更容易失业。人口素质也急剧下降。开罗在 20 世纪 90 年代，60% 的人口为文盲，妇女文盲率更高。<sup>③</sup> 人口素质低下增加了犯罪率和社会不稳定因素。总之，城市化使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人口剧增带来的上述种种负面影响都在城市市民的心中打下了烙印，使城市社会成员的失落心理愈发严重。

第三是对城市环境恶化的失落。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孪生兄弟，工业化在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造成了环境的恶化。以排水系统为例，20 世纪 60 年代，中东大多数城市缺乏完善的污水排放处理系统；20 世纪 70 年代，新的污水处理系统在一些大城市建立，但随着人口剧增而很快相对滞后。20 世纪 80 年代，伊斯坦布尔全部污水的 25% 未经处理就流入金角湾，环绕该城的水域受到工业废水的严重污染。<sup>④</sup> 1980 年，开罗为“世界上最喧闹的城市之一”，在车辆和行人拥挤时，开罗街上的噪音可达到 80 分贝以上，远远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 45 分贝标准。<sup>⑤</sup>

① [埃及] 侯赛因·凯法菲：《埃及》，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54 页。

② CIA, Accessed January 2011, *World Factbook*, August 8, 2012, <http://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index.html>, 2018-07-16.

③ 车效梅：《当代开罗城市化问题探析》，载《西亚非洲》1997 年第 5 期，第 32 页。

④ Michael N. Danielson Rusen Keles, *The Politics of Rapid Urbanization*, Holmes & Meier Publishers, New York, 1986, pp. 133-134.

⑤ Ibid.

第四是对城市拆迁改造的失落。一方面，城市扩张直接导致中东政府实施大规模的拆迁工程，典型事件为对非法占地建房的城市“边缘群体”实施暴力拆迁。1977年末1978年初，德黑兰市政当局在没有采取任何安置措施的前提下，对大量城市“边缘群体”居住的棚户区进行强制拆迁，造成大量城市“边缘群体”无家可归。<sup>①</sup>另一方面，城市扩张使城市逐渐失去历史韵味，市民失去对城市的历史记忆感和亲切感，在新的城市中找不到自我归属感，从而产生强烈的失落感。

### （三）心理挫折感严重

中东城市社会心理挫折感在老新市民中都存在。由于新市民又分为毕业的大、中院校的学生和来自农村务工的“边缘群体”，因而新市民的挫折感又分为青年学生的挫折感和“边缘群体”的挫折感。

老市民的挫折感主要体现在其原本优越性的丧失。在大规模城市化开始之前，中东大城市的原居民都有一种优越感。在他们看来，大城市象征着先进、时尚、幸福的生活，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居民也就自然产生“高人一等”的感觉。而中东进行大规模城市化后，城市的老市民发觉他们的生活变化了。其一，他们引以为傲的生活环境——城市，已经不由他们独享，这里开始居住着大量被他们从前瞧不起的“非城市人口”。由于中东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超负荷，加重了市民住房的危机。埃及历届政府均重视开罗的房屋建设问题，但由于人口增长的速度过快，住房问题依然严峻。据统计，开罗每个房间的居住人数由1947年的2人上升至1960年的2.3人，1976年则达到3.32人。20世纪90年代，在开罗一小套公寓要卖3万埃镑<sup>②</sup>，远超出一般市民家庭的经济承受力。于是，贫民窟、“死人城”、楼顶房等房屋类型在开罗出现。其二，他们认为大量新来的“边缘群体”抢了自己的生计，增大了自身的就业压力。其三，少数外来人员甚至是“边缘群体”成员发家致富，挤入城市中产阶级甚至上层社会，彻底摧毁了老市民的心理优越感。

此外，老市民在住房、子女上学等诸多问题上都受到了新市民的冲击，一些人由此产生了“金钱至上”的观念，从前的优越感与现实的反差加重了

---

<sup>①</sup> Farhad Kazemi, *Poverty and Revolution in Iran: The Migrant Poor, Urban Marginality and Politics*,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1980, p. 88.

<sup>②</sup> [埃及]穆·哈·海卡尔：《愤怒的秋天——安瓦尔·萨达特执政始末》，关称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页。

他们心理上的挫折感。中东国家民众的教育状况一直不容乐观。在奥斯曼帝国后期，其教育机构主要有传统清真寺学校、国外传教士学校、私立学校和公办的世俗学校。其中，公办的世俗学校便是奥斯曼政府在国外传教士及私人学校控制奥斯曼教育体系的局面下兴办的，是中东现代教育的先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新建立的民族国家纷纷开始现代教育的建设，扩大教育规模，大力发展基础教育、高中教育和技术教育，但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例如，教育质量不高，技术专业生源有限，高校过度招生引起就业问题严峻等等。而就业问题成为中东国家市民对教育失望的主要原因。当然，从教育层面上看，就业形势严峻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除了学校过度招生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学生在就读专业分布上的不均。大多数学生不愿选择技术、工程类学科，从而造成人才市场供需脱节。

新市民的挫折感主要体现在青年学生的挫折感和“边缘群体”的挫折感。前者主要反映在就业、择业不理想方面。青年学生怀着改变命运的理想到大、中城市上学，但由于中东国家大、中院校“重文轻理”的专业设置，使得大量学子毕业后难以找到工作，甚至面临失业。这种从“天之骄子”到“待业青年”的身份转变往往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后者的挫折感则包含更多内容。“边缘群体”从农村来到城市，把城市当作实现梦想的地方和获得幸福的天堂。实际上，他们居住在“边缘区”甚至贫民窟，生存环境恶劣，医疗、卫生条件极差；他们常常处于失业边缘，或者只能从事老市民不愿意干的“脏、累、苦”工种；他们受到一些老市民的歧视与排挤。在他们看来，自己虽为城市发展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却被认为是影响“城市尊严”的一群人。这种残酷的现实使“边缘群体”挫折感极为严重。

#### （四）心理压力过大

随着中东城市化进程的深化，城市的生活节奏大幅度加快。中东大城市中充斥着行色匆匆的市民，这种生活与中东传统崇尚自由、游牧生活的习俗相违背。中东在城市化轰轰烈烈开展的同时，城市的生活成本逐渐提高，城市社会成员整日为生计奔波，年轻人更是为了缓解买房、结婚、养育子女等生活压力而努力工作。现代中东城市社会成员普遍心理压力过大，上班族必须努力工作，才会降低被解雇的风险；失业的人也要想尽办法找工作，才能维持生计。



失业有着不可忽视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它是造成大多社会弊端的主要根源，也是引发市民心理压力过大的重要原因，严重威胁市民心理稳定与社会和谐。2011年，埃及发生政治动荡时，官方统计失业率为8.5%，但实际失业数字可能更高。<sup>①</sup> 失业不仅是中东国民经济尤其是造成劳动力市场不安的首要问题，而且成为影响市民心理的主要问题，严重危及政治和经济稳定、社会和谐和市民心理健康。失业是一个国家宏观经济失衡的主要指标之一，是许多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失业意味着部分人力资源没有得到利用，即愿意并且有能力工作的人没有投入生产。对失业者及其家庭而言，失业意味着丧失工资收入，从而极可能陷入贫困之中。埃及人口普查将劳动年龄人口分为两类：一是劳动力，包括自主雇佣者、业主、工资劳动者、给亲友工作而不获取报酬者、长期失业人员和临时失业人员；二是非劳动人员或丧失劳动能力者，包括全日制学生、全日制家政人员、不愿工作的人、养老金领取者、不工作的老龄人和丧失工作能力者。长期对失业问题产生失落感的主要是前一类失业者。

市民的心理压力还源于对生活状况普遍恶化的不安全感。以城市“边缘群体”为例，他们患病率相对高，且得不到有效救治。“边缘群体”因为居住环境卫生条件差而常常染上疾病，而“边缘区”的医疗条件又极为恶劣，因而常常得不到救治，患病率甚至死亡率都较高。另外，城市“边缘群体”的离婚率较高，邻里关系不睦。他们很多人酗酒甚至吸毒，抱怨社会，仇视社会其他阶层，因而人际关系往往不好，生活幸福感极低。

#### （五）心理孤独感凸显

面对城市化给中东城市带来的现代建筑，一些中东城市社会成员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孤独感。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东城市的居住环境和空间结构发生了极大改变，原来的社区及宅院越来越少，西方式的高楼大厦及公寓式住房越来越普及。在这种居住环境里，中东的城市社会成员失去了从前街坊邻居之间的亲密关系。在前现代社会的中东城市，中东人一般每户一个宅院，贫穷的人家则两家共享一套宅院，大门外是街道。由于街道狭窄，房屋不隔音，甚至行人走在街道上都能听到屋里人的对话。中东人一般都知道整个社区居住哪些人，每户人家的人员构成及其他情况。一个家庭若遇到困难或发

---

<sup>①</sup> 安维华：《埃及的经济发展与社会问题探析》，载《西亚非洲》2011年第6期，第20页。

生争执，邻居都会自发前来帮助或劝解，邻居之间闲暇时也会一起坐在门口聊天或相约去咖啡馆、剧院、公园、饭馆等。而城市化进程开始之后，在现代化公寓住宅里，居民甚至不知道周围邻居是谁，更不用说与之交朋友了。在这样的城市人际关系中，他们在心理出现问题时无人倾诉，面对城市林立的建筑群，一些市民往往会感到自身的渺小、无助，进而出现严重的心理孤独感。

这种心理孤独感在外来移民群体——城市边缘群体中尤为突出。从社会心理学视角来看，边缘人也可称为“过渡人”或“边际人”，是“在社会文化变迁或地理迁徙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转型人格”，是“在新旧文化或本族文化与他族文化的碰撞、选择、冲突下导致人格分裂呈多变双重化的产物”。<sup>①</sup>“边缘群体”在以下几方面受到歧视：其一，在就业方面，由于“边缘群体”素质低、缺乏基本的技能，因此只能从事一些“边缘”的职业，即普通市民不愿从事的脏、累、苦、险职业，如建筑、保姆、环卫、搬家等工作。其二，在居住方面，“边缘群体”长期居住在“边缘区”和贫民窟，普通市民不愿与他们毗邻。埃及在整治开罗贫民窟问题时曾计划将贫民窟整合进普通社区，但遭到了开罗市民的普遍反对，多数人表示不愿和在他们看来“肮脏、暴力的人”住在一起。因此，“边缘群体”的长期聚居经常是同一地方的人居住在一起，逐渐形成小团体意识，更加缺少市民认同。其三，在社会接纳方面，“边缘群体”在社会上经常遭受一些市民的冷遇，被视为“不讲卫生、没有文化且具有犯罪倾向”的群体，无法被真正接纳。其四，在政治参与方面，“边缘群体”的政治参与是极为有限的。一方面，“边缘群体”常常为解决温饱问题而奔忙，鲜有闲暇顾及政治。政府工作人员较少与“边缘群体”沟通，“边缘群体”的政治诉求缺少常规的表达渠道，“边缘群体”的政治能量得不到合法的吸收和化解，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大选投票率低。这样，边缘区成为孤立于主流社会之外的政治孤岛。另一方面，与其他地区相比，“边缘群体”的压迫感和剥削感日益严重。“边缘群体”生活在城市边缘，也处于国家机构的边缘，他们往往容易诉诸非常态的政治参与，无形中卷入政治暴力和政治动荡。只有在政治发生动荡时，政府才能感受到他们的力量。2011年初，开罗爆发政治骚乱，一些来自边缘区的民众在解放广场喊出了“我们都是埃及人”的口号，这实际上彰显“边缘群体”渴望被关注的情势。

<sup>①</sup> 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30页。

总之，过度城市化导致大量农村人口急剧涌入城市，从而使得城市人口的异质性空前强化，各种有着不同生活习惯、社会习俗、宗教信仰及价值观念的陌生人迅速聚集，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的机会虽多但更为短暂，大量初到城市的农村移民往往难以适应城市生活而导致文化冲突不断。因此，在过度城市化环境下，个人极易失去适应性，城市匿名性（陌生与冷漠）所体现的消极影响更为突出，而城市匿名性的急剧增强，极易成为中东国家发生诸多违法犯罪行为的重要诱因。

## 城市治理不善与市民心理危机的产生

中东过度城市化导致其城市化进程迅猛而城市社会整合缓慢，社会变迁急剧而社会心理危机重重。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爆炸”式发展与城市管理效率低下错位，其结果是中东城市成为矛盾聚集地，城市“犹如一只火药桶，只需一点儿火星——一点儿希望的星星之火或一点儿动荡不安的星星之火，随即就会轰隆爆炸。”<sup>①</sup> 市民心理危机的产生与城市治理不善密不可分。

### （一）政治腐败

腐败是人类社会复杂的政治现象之一。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腐败”作出过多种定义，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当属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sup>②</sup>在其《腐败与政治发展》中提出的观点：“腐败是为私人、家庭成员或私人小圈子获取金钱、身份而背离公共角色的规范职责的行为，或违反那些旨在防止滥用私人影响以谋取私利的规则的行为。腐败包括贿赂、裙带关系和盗用。”该定义凸显了腐败主体的“公共角色”，将腐败行为与腐败主体的公共角色相联系，并指出腐败是违背“规范职责”以及限制性、预防性规范的行为。<sup>③</sup>“腐败”可依据不同视角进行多种分类。本文借用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系教授约翰·约瑟夫·沃利斯在《美国政治和经济历史中的体制性腐败》一文中的分类方法，将腐败分为体制型腐败（systematic corruption）和收买型

<sup>①</sup> [德国] 拉尔夫·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林荣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sup>②</sup> [美国] 约瑟夫·S. 奈，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曾经担任过美国助理国防部长，提出了“软实力”（Soft Power）的概念。

<sup>③</sup> Joseph S. Nye, “Corrup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 Cost - Benefit Analysi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1, No. 2, June 1967, pp. 417 - 427.

腐败 (venal corruption)<sup>①</sup>。体制型腐败指政府官员利用手中掌握的政治权力和政治资源,通过有选择性地给予某些利益集团一些经济特权来获得利益,并利用所得利益巩固、加强其政治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讲,体制型腐败一般出现在社会转型期,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较为明显。而收买型腐败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市政管理体制存在漏洞,利益集团利用这些漏洞,通过收买政府官员从而对政治权力形成控制。在中东城市化进程当中,这两种类型的腐败同时存在,但收买型腐败的色彩更重一些,并主要表现在市政官员的腐败和警察系统的腐败等。一方面,中东国家的市政体制存在漏洞,对于腐败的监管力度不够,给一些利益集团收买政府官员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政府官员也通过有选择性地给予某些利益集团一些经济特权来获得利益,并利用所得利益来巩固、加强其政治优势。

20 世纪后半叶至今,中东处在社会动荡、问题丛生的社会转型期。城市发展和城市管理混乱并存。市政府没有对城市、“边缘群体”进行有效且规范的管理。而从农村不断涌入的“边缘群体”,则进一步加重了城市的负担。“边缘群体”在城市里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并没有引起市政府的足够重视,使得城市日益混乱。这一时期,城市管理的核心问题就在于缺乏一个分工科学、责任明确的市政管理机构。市政管理机构本身设置混乱,再加上与中央政府之间权限划分不清、职责不明,结果导致有的方面权力叠加,有的方面权力真空。阿拉伯学者阿卜杜勒·阿齐兹·奥斯曼指出,“阿拉伯剧变”推翻了世袭独裁统治,并实现了通过投票箱赢得选举的“民主”制度,但是以这种方式上台的一些新当权者则仍有独裁行为,以此树立新政权的权威。<sup>②</sup> 沙特作家图尔基·哈麦德质疑到:“民主不仅是选举和投票箱,它更代表了文化与社会价值观,理应在人们走近投票箱之前深入人心,这些价值包括宽容、接受他者、承认选民意愿等。由于中东国家长期存在威权统治,这些价值观在阿拉伯世界和阿拉伯的政治文化中是不足的。”<sup>③</sup> 也就是说,一些中东国家当政者

---

① John Joseph Wallis, “The Concept of Systematic Corruption 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History”, *Nber Working Papers*, 2004, <http://www.bsos.umd.edu/gvpt/apworkshop/wallis05.pdf>, 2018 - 07 - 10.

② 于颖:《阿拉伯学者谈对“阿拉伯之春”的看法》, <http://www.aisixiang.com/data/93796.html>, 2018 - 08 - 04。

③ [沙特阿拉伯] 图尔基·哈麦德:《关于民主和阿拉伯人民革命的前景》, <http://www.darlibrl.com/vb/showthread.php?t=23269>, 2018 - 08 - 04。

需要避免“赢者通吃”现象的发生，树立民本思想，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导致中东国家政治腐败产生的原因有多重因素，其中与国家法制不健全、部分公职人员道德水准低下有密切关系。在腐败现象发生后，市民对此逐渐由痛恨转为麻木、由麻木转为适应，一些民众甚至利用腐败者为自己获取一些正当或不正当的利益。这实际上折射出他们对城市治理的失望与放弃对政府寄予希望的“适者生存”的悲剧心理。

## （二）边缘区治理不善

城市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为城市居民提供一个整洁卫生、治安良好、运转有序的城市环境，为城市居民提供诸如就业、医疗、救济、法律等方面的服务。而对边缘区的治理则成为衡量政府对城市治理效力的一把有力标尺。城市“边缘群体”形成后，倘若政府治理不利，他们的内心则易出现一种社会失落感，直接导致了他们对政府的怀疑与不认同。“边缘群体”产生心理失落的原因如下：

边缘区的存在是诸多中东城市的一大特点，主要表现为：多数住房环境差，合住现象普遍，房间内拥挤不堪；缺乏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自来水、下水道、电等最基本的日常设施需求及服务无法得到保障；街道狭窄，人口稠密，工商业活动区与居民生活区混杂；缺少必备的绿化和居民运动场所；缺乏应对突发危机的消防设施、卫生防疫设施等装备；卫生与教育条件差等。基于此，“边缘群体”成为城市中生活条件较差、在心理上有强烈失落感的社会群体。以开罗为例，城市边缘区在埃及城市中普遍存在。据估计，埃及城市边缘人口达1 156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近20%。据埃及住房建设部1993年的研究数据显示，全国共有1 034处城市边缘区，大开罗有171处。其中开罗省79处，盖勒尤卜省60处，亚历山大省40处，吉萨省32处，“边缘群体”人口占开罗省、吉萨省人口比例的35.9%和62%。吉萨省是全国各省中城市边缘人口最为拥挤的省份，达225万人；开罗次之，219万人；亚历山大为111万人。<sup>①</sup>

对于边缘区的治理，埃及主要采用三种方法。一是建造卫星城，将边缘区居民整体乔迁；二是拆掉旧房，将生活在边缘区的居民分散地迁到其他社区；三是对边缘区进行改造。第一种方法的缺陷是新建的卫星城一般离边缘

<sup>①</sup> 毕健康：《当代埃及的城市边缘区问题》，载《世界历史》2002年第6期，第4页。

区居民的工作地点较远，搬迁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失业，所以得不到“边缘群体”的积极回应；第二种方法也难以进行，这是因为政府反复宣传边缘区的“脏乱差”，引起了普通市民对边缘区居民的反感和排斥，他们不愿让带着“脏乱差”标签的人住到自己的社区中，因而出现了抵制政府政策的示威游行。由于前两种方案都差强人意，对边缘区的改造遂成为城市治理的应因之策。

边缘区（棚户区）改造的主要任务是建设、规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改善居民生活环境、生活质量。埃及曾对边缘区实施了两期改造工程：第一期工程从1993年到1997年，正值埃及第三个五年计划，改造了11个省的667处棚户区，其中包括大开罗3个省（开罗、吉萨和盖勒尤卜）等，涉及约700万人口；第二期工程从1997年到2002年，正值埃及第四个五年计划，改造其他10个省的棚户区，包括苏伊士、伊斯梅利亚、塞得港等。

然而，棚户区改造计划举步维艰。首先，改造范围大，巨大的投资给政府带来严重的财政压力。改造计划是要在十年时间内解决数十年来遗留的老大难问题，其难度可想而知。政府财政的拨款对于改造工程来说可谓杯水车薪，即便中央财政能够及时并足额将资金拨付到位，地方财政也很难进行有效配套。其次，在工程实施、监理过程中，政府各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施策存在诸多问题。地方政府常常以改造工程为名将款项挪用到非棚户区。再次，1997年以后，南埃及、西奈、苏伊士湾和塞得港等国家大型工程纷纷上马，严重挤占了棚户区改造工程的资金。最后，边缘区的治理问题和暴力等市民行为的异化是互相作用的两个因素，边缘区治理的失败导致市民尤其是边缘群体的行为异化、暴力频发，但正是这种异化的行为才促使政府重视边缘区的改造。20世纪90年代末，埃及经济改革初见成效，经济发展逐渐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同时，边缘区的政治暴力事件渐渐平息，政府对边缘区的改造逐渐丧失了热情。

### （三）贫富差距的扩大

中东地区贫富差距悬殊，少数富人阶层过着穷奢极侈、挥金如土的生活，这在海湾产油国最为明显；而大多数城市普通社会成员为生活奔走，甚至失业，在生存线上挣扎，即便是有工作的人，也因为房价、物价的上涨而过着较为艰难的生活。加之，上文提到的“边缘群体”和边缘区的存在，更加剧了这种贫富分化的差距以及贫困阶层的不满。穷人的仇富心理、心理不平衡感上升，为市民尤其是包含“边缘群体”在内的穷人的行为异化埋下了伏笔。

事实上，社会济贫制度是缩小居民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发达国家通过卓有成效的城市管理，基本在城市中建立起完善的福利体制，通过各种政策和制度供给为人们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发展中国家的济贫制度往往很不完善，不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容易导致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沦落为贫困人口，其中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对贫困人口的影响最大。

在中东，城市居民的生活保障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保障，即社会保险、公共扶助、社会服务；二是雇佣保障，即有关雇佣的相关政策。雇佣保障是生活保障的基础，将失业率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不仅贫困率会大大降低，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也将大大缩减，还可以维持社会稳定。这是一种积极的济贫制度。而社会保障、公共扶助则是解决城市居民因失业、疾病等风险导致不能得到稳定收入的最低生活保障。社会保障制度与济贫制度是维持城市社会稳定的“蓄水池”，通过政府的二次分配来实现社会的相对公平。此为消极的济贫制度。

在伊斯兰教的传统观念中，穷人也应该受到保护。《古兰经》的教义规定，富人应该意识到“乞丐和贫民应有的权利”。<sup>①</sup> 城市贫困的加剧和贫富差距的扩大不仅与伊斯兰教义相悖，而且滋生出宗教激进主义，严重影响城市的社会稳定和经济运行。从政治学意义上看，城市贫困问题的长期存在对社会价值观、道德观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如果政府长期疏忽贫困问题，则可能造成社会成员平等、公正、同情、互助等意识淡薄，从而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城市贫困现象与政府推行的一些失当的社会政策相关。因此，政府应该成为减贫方案的制定者、决策者和管理者，这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济贫制度不仅是中东城市得以持续发展的保障，而且是中东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具有重要的意义。奥科克指出，“从政策决定问题的意义上来看，贫困的界定通常取决于应对贫困的各项政策，于是政策和贫困就好像学术圈内存在着的‘鸡和蛋’的谜面，理解贫困首先就要去理解政策。”<sup>②</sup> 这段评论恰如其分地说明了济贫制度与减少贫困之间的复杂关系。例如，向城市贫民发放食品补贴、修建廉租房可能会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但这些措施很可能会吸引更多的农村贫困人口涌向城市。

---

<sup>①</sup> Albert Hourani, *A History of Arab Peopl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2002, p. 120.

<sup>②</sup> Alcock, *Understanding Poverty*,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London, 1993, p. 13.

中东产油国特别是海湾六国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海合会成员国不仅不向民众征收税款，反而利用巨额石油收入来提供高福利，向民众转移石油收益。这种做法有悖于福利经济学的原则，不仅不能形成可持续的经济体系，而且还阻隔了民众的政治参与。当油价受国际经济的影响剧烈波动时，这种福利政策必然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其他中东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则普遍存在社会保障制度滞后，覆盖面狭窄，社会事业保障、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不完善，甚至某些重要保障制度缺失等问题，无法为城市人口提供有效保障。中东国家的社会保险种类较为简单，主要为社会提供退休金，国家职工从 60 岁以后就可以享受退休金，此外，还为孕产妇提供全薪。<sup>①</sup>

中东的社会保障制度以政府为主导，而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的参与则明显不足，造成国家负担的日益加重。如在穆巴拉克时期，埃及政府为减少财政赤字而削减生活必需品补助金的发放金额。1992 ~ 1997 年，政府发放的生活必需品补助金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 5.2% 下降到 1.6%。<sup>②</sup> 即便如此，有限的社会保障也未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埃及低收入阶层占总人口的 30%，但国内的物价补贴仍然覆盖近 80% 的人口。

中东现有的济贫制度偏重于发放生活补贴等方式的消极应对，类似于向贫困人口“输血”。可持续发展的济贫制度应侧重于帮助贫困人口恢复“造血”功能，即提升他们摆脱贫困的能力。埃及等国的失业保险规模小，在社会保险中微不足道。这就意味着城市居民一旦失业，就陷入贫困的境地。除了失业保险外，政府应该推动在职培训以及失业人员的技术培训，提高其职业技能，以帮助其再就业，同时为进一步的产业调整储备劳动力和人才。中东各国的高等教育应加大职业教育的力度，培养实用型人才，以解决高学历人员失业的怪现象。政府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时候，要适当考虑就业问题，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

城市的第一要素是人，城市济贫制度也应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中东各国应该鼓励大众创业和创新。在城市化过程中，中东国家不仅要重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及反贫困职能，还要提升城市居民个体的反贫困能力。此外，中东国家还应鼓励非政府组织和城市社团共同参与反贫困行动，多管

<sup>①</sup> Rodney Wils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 Routledge, London, 2005, p. 182.

<sup>②</sup> 哈全安：《中东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第 577 页。



齐下方能达到目的。

城市反贫困体制的建立对于中东的经济稳定乃至社会稳定都意义非凡。贫困意味着资源配置的不合理，贫困人口的大量存在和增加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阻碍了市场的调节机制，最终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贫困及贫富差距扩大反映出分配机制的不合理，将资源转向暴力、寻租和腐败。脆弱的经济加大了政治动乱的可能性，城市也可能成为动乱的中心。

## 市民心理异化行为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中东市民心理危机严重与对政府的城市治理不满情绪交互作用，导致了其行为的异化，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

### （一）中东市民行为异化的表现

第一，犯罪率上升。中东城市的犯罪主体主要是居住在城市边缘区的“边缘群体”以及正在走向社会边缘化的无所事事的青年。中国学者顾朝林先生认为，“城市边缘区的概念发展到现在已经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即同时具有自然特性和社会特性。”<sup>①</sup> 城市边缘区的二元性特征本质上讲属于“个性化”不强，兼有多性，而实无个性，可谓是一个无主流文化控制的紊乱系统，具有过渡性、复杂性、脆弱性等特点。

中东国家除了在经济结构、管理体制方面具有明显的“二元性”特征，城市边缘区的居民住户也具有明显的“二元性”特点。一方面，居民以农村来的暂住人口和外来流动人口为主。另一方面，边缘区还居住着城市化过程中因城市膨胀而外迁的城市中心的老居民（多在边缘区工作或购买第二套住房）以及边缘区的原住户。因而，边缘区中存在贫富和身份的差异。此外，边缘区的外来暂住人口及流动人口成分复杂，其中可能夹杂一些负案在逃的犯罪嫌疑人，因而犯罪率在流动人口中也会迅速上升。虽然在中东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城市边缘区的流动人口违法犯罪类型有所不同，但从目的来看，主要以追求金钱的财产型犯罪为主；从性别来看，以男性为主，同时女性犯罪也有逐渐上升的趋势；从犯罪类型来看，主要是盗窃、抢劫、吸毒贩毒、制假贩假等等；从年龄上看，具有低龄化的特点；从人员学历上看，具有低

---

<sup>①</sup> 顾朝林：《中国大城市边缘区研究》，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学历、高学历混合的状况；从组织形式上看，具有团伙性的特征，且近年来出现普通边缘群体的犯罪团伙与恐怖组织联合的迹象。

第二，暴力活动猖獗。这是近 20 年来中东市民行为异化的主要特征，其中以边缘区的暴力行为最为严重。中东城市的暴力活动按照其目的分为四类：一是纯粹的“边缘群体”的泄愤行为。其主要表现是：处于“边缘群体”的穷人、失业青年、农村移民思想极端化，开始对商店、公共建筑物进行中、小规模大打砸抢。二是为抗议政府的某些政策而采取暴力示威活动。如埃及作为人口膨胀最为突出的中东国家，粮食问题关系到国计民生。仅开罗一个城市便消耗全埃及进口粮食总量的 1/2，而随着进口粮食价格的不断提高，政府每年需要花费巨额资金进行粮食补贴，高额的粮食补贴已成为政府沉重的负担。因此，萨达特总统于 1977 年试图削减此项补贴。这一政策导致 1977 年 1 月全国普遍发生骚乱和暴力活动，又称“大饼动荡或起义”，萨达特只好取消削减补贴的决定。<sup>①</sup> 1990 年 5 月，3 000 名纺织工人为抗议食品涨价而上街游行，1991 年又发生罢工活动 20 起，静坐 3 起，游行示威 3 起；1992 年发生工人罢工 10 起，静坐 5 起，游行示威 5 起。<sup>②</sup> 三是恐怖主义暴力活动。中东市民的异化行为往往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组织的支持，由此发生政治暴力活动。四是畸形的政治参与式暴力。中东边缘区人口在政治参与过程中，金钱与暴力在边缘区的选举中相互结合，使这种政治参与日益畸形。城市边缘区的选举暴力事件引人深思，埃及在 1990 年的选举中共发生 70 起暴力事件，城市边缘区是高发区。在选举过程中，一些政党的候选人和独立候选人借助当地不法分子对其竞争对手的支持者施暴。候选人雇佣恶棍流氓，按日支付报酬，在有的选区日报酬甚至高达 200 英镑。<sup>③</sup> 城市边缘区的暴力活动大多是自发性且无组织的，一旦遭到政府镇压，便会导致人力、物力的巨大损失。

第三，恐怖主义蔓延。中东地区如今是恐怖主义活动的多发区。中东恐怖组织主要表现为以政治诉求为主、以宗教诉求为主、国家恐怖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四大类。从冷战结束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中东恐怖主义的主要目标是夺取所在国政权；受海湾战争的影响，90 年代中期以后，中东的恐怖主义组织减少了对本国政府的恐怖活动，转而针对美国、以色列和其他国家。

① 车效梅：《当代开罗城市化问题探析》，载《西亚非洲》1997 年第 5 期，32 页。

② 毕健康：《当代埃及的城市边缘区问题》，载《世界历史》2002 年第 6 期，第 8 页。

③ 同上文，第 8 页。

无论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还是中东恐怖主义组织，都利用了宗教因素来鼓动群众，而被鼓动参与恐怖活动的主要是中东的“边缘群体”。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伊斯兰极端组织与犯罪分子互动，成功渗透中东边缘区。其原因在于：首先，边缘区人口稠密，容易藏匿，易于找到廉价的住房，也便于开展活动。极端分子多与边缘区家人或亲戚住在一起，易于隐蔽。即使政府知道“棚户区与极端分子相互交错”，亦无能为力。其次，城市边缘区人口庞大，超过了国家安全机关的控制能力。同时，边缘区街道狭窄、房屋密集，一旦警方与伊斯兰极端分子交火，警车不易通行，且易造成无辜伤亡。再次，与生活在其他地区的居民相较而言，边缘区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文化水平较低，极易吸收极端思想。最后，处于边缘地位的中东市民对社会的不满及心理危机使其产生了反工业化、现代化的倾向，尤其是当城市化给中东国家带来诸多社会问题时，“边缘群体”能诉诸的思想武器就是从小接受的传统宗教，由此加剧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甚至恐怖主义的蔓延。

极端主义组织拉拢“边缘群体”的手段主要有：其一，伊斯兰极端组织弥补了政府在城市边缘区的真空，宣扬自己的伊斯兰理想是“致力于社会公正”，提供社会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行使了政府的某些职能，并能够按国家机构的模式解决民众的实际问题，因此赢得了一定的社会基础，有利于他们拉拢边缘区的民众。其二，对贫困人口进行组织和政治动员。边缘区畸形的政治参与和选举暴力对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稳定威胁不大，但城市边缘人口一旦卷入恐怖主义的政治暴力则另当别论。

由于以上因素，“边缘群体”或边缘区的恐怖主义暴力活动成为困扰中东国家政府的问题之一。早在20世纪70年代，一些中东国家警方与伊斯兰极端分子在城市边缘区的暴力交火就已开始。1981年埃及萨达特总统遇刺后，被抓捕的442名“圣战”组织和伊斯兰集团成员多数来自城市边缘区。1988年12月艾因·夏姆斯事件首次揭露出极端组织与城市边缘区犯罪集团存在事实上的联盟。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城市边缘区成为中东国家警方与伊斯兰极端组织暴力冲突的重要战场，并成“消耗战态势”。1992年底，埃及保安部队调集14000余人，大规模清剿吉萨省的边缘区因巴拜。1994年，开罗省对城市边缘区的清剿作战多达23次。<sup>①</sup>

<sup>①</sup> 毕健康：《埃及现代与政治稳定》，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27页。

## (二) 市民心理与社会稳定

中东过度城市化特点构成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第一,过度城市化孕育着社会不稳定心理。中东城市化的迅速发展提高了公众(特别是农村移民)的社会期望,但由于城市化与工业化的严重脱节,使得原有的社会期望与实际的社会满足之间形成巨大鸿沟,公众心理不满,从而导致各种城市问题频出,城市中大部分农村移民的悲观失望情绪蔓延。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说“期望与满足剧增,但满足的增速低于期望”,“或期望增大,但满足先增后减”,于是强烈的期望受挫感和相对剥夺感迅速产生,进而可能在整个社会形成一种政治骚动的社会氛围,对社会稳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sup>①</sup>

第二,中东城乡二元制社会导致社会整合性不强。20世纪后半期,尽管中东国家先后获得独立,但殖民主义遗产犹存。中东国家城乡生活在物质层面、文化层面以及制度层面的冲突长期持续,<sup>②</sup>政府忽视农业使其逐渐趋于恶化。随着过度城市化的加剧,少数大中城市涌入大量农村人口,导致城市人口急剧膨胀,相对于城市化速度的城市经济发展速度滞后,大量进城的农村人口的就业和生活无法获得保障。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实际仅仅是在地域空间上的转移,在生产、生活方式及文化特性等方面他们依然保留着农村状态,如此一来,城乡文化的冲突愈加明显。“农村移民长期脱离主流社会,他们对主流阶级所信奉的基本制度怀有敌意,仇视警察,不信任当局政府及位居高层的人。”<sup>③</sup>因此,被边缘化的农村移民群体内部所形成的亚文化本身就潜伏着一种对现有社会秩序的反抗。随着城市贫富差距的增加,贫弱群体必将会因利益受损而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和“绝对剥夺感”,这严重影响着社会稳定。正如戈德斯通(Goldstone)在其历史调查中所说的那样,急剧的食品价格上涨及大规模失业,往往使得长期饱受贫困之苦的家庭无法承担这突如其来的经济冲击,于是骚乱便发生了,并对现有社会秩序产生极大的破坏性,20世纪80年代开罗和阿尔及尔发生的骚乱便是如此。<sup>④</sup>

第三,城市社会结构变迁影响导致部分市民群体心理失衡。伴随着过度

① [美国] S.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43页。

② 向德平:《城市社会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2~234页。

③ [美国] 布赖恩·贝利:《比较城市化——20世纪的不同道路》,顾朝林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91页。

④ Michael E. Bonine, op. cit., p. 240.

城市化,大量农村人口移民城市,随之产生的城市失业、贫困等一系列城市问题改变了中东城市原有的社会结构。而高失业率进一步恶化了中东城市中固有的贫困问题,以农村移民为主体的“城市边缘群体”兴起。处于此种社会结构下的城市边缘群体,由于就业岗位有限,长期工作在各种非正规经济部门中,经济收入毫无保障,再加上城乡文化冲突造成的“身份歧视”,使其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社会,这必然造成他们产生强烈的社会不公正、被剥夺感。贫困移民特别是非法居住者既要为食物和就业问题而奋斗,还要经常参加“为争夺土地和住房的令人绝望的械斗。”<sup>①</sup>

芝加哥学派代表人齐美尔在其《大都市和精神生活》开篇就指出,人们都处于足以使他们窒息的客观力量重压之下,人们的心理、情感生活因为受到内部、外部不断的变化刺激而变得极度紧张。<sup>②</sup>大城市的人口密度,不仅使单位空间人口数目增多、城市环境恶化,而且产生了不同的心理负荷和“容忍差异”意识。城市吸纳了大量高度分化的人口,由此形成的城市异质性不仅使传统的控制方式遭到削弱,而且滋生大量社会问题。<sup>③</sup>中东城市“边缘群体”中存在社会焦虑与社会失落感并存的心理状态,由此形成无形的屏障,阻碍了他们与市民的认同和融合。快速城市化可以造成社会、经济和心理的分化和紧张,这些紧张感带进政治领域可以成为一种不稳定的因素。”<sup>④</sup>

城市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移民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被吸引到城市地区,而大多进入城市的人并没有真正享受到这些城市的福利,并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而形成强烈的心理失落感。这种失落感严重影响了他们对政府的信任与支持以及与普通市民的融合,“边缘群体”常常成为暴力反对政府的民众。

## 结 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引发社会心理问题<sup>⑤</sup>,尤其是

---

① Farhad Kazemi, op. cit., p. 51.

② [荷兰]根特城市研究小组:《城市状态当代大都市的空间、社区和本质》,敬东译,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年版,第223页。

③ 潘允康:《城市社会学新论——城市人口与区位的结合与互动》,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④ Farhad Kazemi, op. cit., p. 60.

⑤ 中东城市化引发的市民心理变化包括方方面面,由于本文聚焦市民心理危机对于社会稳定的冲击,因此分析侧重点突出“问题”意识。

中东剧变后的城市乱象，使“中东城市还会继续发展吗？”成为不可避免的话题。城市学者怀特（White）和怀特妮（Whitney）总结了 11 个对城市发展影响最为突出和明显的“压力点”，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一个框架，即：城市环境、食物、水、住房、动力设施、教育设施、交通设施、娱乐、健康、就业和社会犯罪。这些“压力点”在中东城市中不仅存在，而且压力值高。

环境问题在中东城市已十分突出，大城市尤为严重。恶劣的生态环境不利于居民心理健康，而且更加剧其被压迫感和失落感，埋下社会稳定的隐患。“每一个移民到城市或者是在城市出生的人都意味着对在农村地区或者是世界上其他地区生产的粮食的需要。”<sup>①</sup> 因为农业基础薄弱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导向，中东城市无法满足城市人口的粮食消费需求。如今，中东大多数国家依赖于粮食进口，“从长远来看，在经济上、生态上、政治上都是不稳定的”<sup>②</sup>，更重要的是，它造成居民尤其是“边缘群体”心理不稳。中东城市爆炸性的人口增长给城市住房带来空前压力，缺乏合理规划的“贫民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破败、脏乱和犯罪的代名词。中东国家虽已采取措施，但收效甚微，居住地的安全隐患仍在，恶性事件频频发生。中东城市青年人失业现象严重。加之，青年人往往具有冒进、冲动的性格特点，在不利的环境下，增加了他们走向极端的可能性。突尼斯街头小贩的自焚为其表现手段之一，由其引发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政治风暴，我们不得不反思中东城市经济结构、教育、市政、治理、城市人心理健康、城市犯罪等问题。

因此，中东城市要持续发展，势必要减轻上述“压力点”的压力值，而城市治理为其解决的主要途径。城市治理强调民主、平等、合作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力图通过城市利益主体之间的理性协商，达到缓和社会矛盾、维护城市稳定与发展的目的。如今，中东城市政府正在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如重视城市规划、关注民生、发展科技、振兴经济。但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中东城市治理体系并不完善，还不能及时应对民众的合理诉求，与社会团体协作仍在磨合中，城市治理的民主化进程缓慢而曲折，且需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治理路径。

---

① Michael E. Bonine, *op. cit.*, p. 332.

② *Ibid.*

## Urbanization, Psychological Crisis and Social Stability in the Middle East

*Zhang Dan & Che Xiaomei*

**Abstract:** As the front of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 urbanization, cities in the Middle East have many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social stability in this region. Among them, the citizen psychology is the direct reflection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influence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different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citizen stratum often lead to different social psychology. The urban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is characterized by excessive urbanization. The rapid pace of urbanization has raised people's psychological expectations, but it is often unable to meet their actual social needs. At the same time, the heterogeneity of cities makes people feel lonely and distrust. The innovation of the systems also easily leads to psychological crisis, whic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stability of cities. The psychological crisis of marginalized groups may lead to their negative behaviors at any time. Therefore,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itizens' psychological crisis and urban stability in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Middle East, on the one h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security system should be accelerated to ensure the basic needs of social members; on the other hand, urban governance should be strengthened.

**Key Words:** Psychological Crisis; Social Stability; Urban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Urban Governance; Marginalized Group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安春英)